

疫情危机下东亚生产网络 协调机制与合作策略

■李天国 沈铭辉

2020年初大规模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在疫情不断蔓延的背景下,东亚生产网络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疫情从供给侧、需求侧、供应链和金融等领域影响东亚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一些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面对来势汹涌的疫情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东亚经济体要加强东亚区域联防联控,建立高水平的疫情防控协调机制;加强东亚区域宏观政策的协调;中日韩三国要密切协作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东亚生产网络;供应链;区域性生产网络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0)07-0045-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美经贸合作重大问题研究”(18JZD03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异质性视角下中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研究”(18YJA790099)

李天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沈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07)

当前在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疫情)给全球带来了重大影响。疫情涉及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数比例约为85%,占全球GDP和国际贸易比例超过96%。为防止疫情蔓延升级,全球超过60个国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亚洲、欧洲、美洲相继成为重灾区,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世界经济遭受巨大挑战。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的重大整体威胁。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管制,包括旅行禁令、入境管控甚至封锁边境措施。在疫情不断蔓延的背景下,东亚生产网络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把握疫情对东亚生产网络的传导机制与影响,不仅有助于维护东亚区域供应链安全,也有利于研究制定东亚各经济体共同应对方案,降低疫情带来的冲击。

一、东亚生产网络格局

东亚生产网络与美国北美区域生产网络、中东欧区域生产网络被认为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区

域性国际生产网络。^①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逐步形成遵循产品在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展开的地区性分工,并通过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成多层次、网络状的新型区域生产体系。东亚生产网络使东亚经济体抓住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关键发展机遇,实现了区域经济体之间分工格局的重塑,对东亚区域地缘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和对外安全产生深远意义。特别是,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与在国际分工体系上的作用极大拓展了东亚制造业发展空间,不断推动东亚生产体系的发展。

第一,东亚区域产业链表现出较强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东亚区域对区域内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要大于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而且这种依赖在不断增强,东亚经济体凭借自身要素比较优势使中间品和零部件贸易在区域内贸易中的比例不断上升。^[1] 尽管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仍然需要对欧美国家在前后向关联中形成的“上游依赖”,但无论从东亚区域整体,还是从东亚单个经济体而言,“外部依赖”呈降低趋势。东亚生产网络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一方面提升了东亚生产体系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对疫情的脆弱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这种“一体式”的跨国产业链之下,无论哪一个环节出现断供,通过上下游传导,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最终都将无一幸免,尽管各个环节受冲击的速度和程度可能存在差异。^[2]

第二,东亚经济体基于产业价值链具有较高的经济同步性。东亚产业内贸易通过生产分割或外包等方式提高了经济周期的同步性。^[3] 东亚经济体之间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最终商品的需求变化更容易使这些经济体产生同方向的生产和贸易变化,外部经济冲击更容易使这些经济体形成协同效应,而这种协同效应提高了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同步性。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品种的增加和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提高也不断强化了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同性。^[4] 此外,经济体在分工体系中形成的即时生产体系也是增加东亚经济体周期协同性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的物流绩效指数与生产体系的效率密切相关,更高的物流绩效指数代表更高的区域生产网络程度和更高的生产体系效率。十多年来,东亚多数经济体的物流绩效得到明显提升,一方面提升了区域生产体系的交易效率,另一方面增强了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同步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物流绩效相较2010年都有明显提升,如中国从30位上升至26位,印度尼西亚从49位上升至46位,老挝从117位上升至82位,缅甸从147位上升至137位,菲律宾从65位上升至60位,越南从53位上升至39位。较高的区域经济周期同步性导致面对疫情等外部冲击时,东亚生产网络可能面临一系列连锁反应,生产网络中的每个经济体都无法幸免。

第三,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生产网络的多数产业中扮演着共同枢纽角色。过去由日韩提供中间产品在中国市场组装加工成最终产品出口世界各地,是东亚区域三角贸易的突出特征。三国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物流链,既是东亚生产网络的亮点,也是全球产业链中的最具活力的组合。^[5] 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大幅提升,与东亚经济体的区域内部的后向关联度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日本与韩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长期占据上游,而中国作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上游供给者的角色不断增强,三国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共同枢纽。因此,疫情暴发的背景下,中日韩三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协调与全方位产业合作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凸显。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冲击

疫情的暴发给东亚及全球经济造成全方位的严重的冲击。中日韩三国的汽车、电子、钢铁、化

工等领域企业不得不暂时停工,三国企业位于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工厂以及相关下游企业也宣布暂时关停。

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出现剧烈波动,指数的最低点发生在2月,达到35.7%。随着中国全面复工复产,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又重新回升至50%以上,5月制造业PMI指数达到50.6%。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负面影响更多地出现在3月和4月。东亚许多经济体的制造业产出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产出下降分别是自2009年12月和2009年1月以来的最大幅度,而新加坡、越南、缅甸和菲律宾的PMI产出指数也处于较低点。5月以来,尽管大部分亚洲经济体的制造业PMI指数出现回升,但大都保持在50%以下的较低水平。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PMI指数受疫情影响有所反复,5月PMI指数较4月份有所回落,分别达到38.4%和41.3%。^[6]综合而言,除中国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经济保持恢复性回升势头外,其他国家(地区)受疫情影响,经济仍保持弱势,恢复力度不大。

根据疫情的传播路径与影响机制,可以把疫情对东亚区域以及全球经济影响分四个阶段:一是疫情对原发国经济产生冲击,二是疫情向国外扩散出现外溢效应,三是国外疫情和经济影响回流疫情原发国,四是主要国家经济影响互动共振与持久影响。^[7]当然,疫情对东亚区域以及全球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不同阶段效应有时会表现为继起性,有时也会出现共时交叉。观察自2020年1月以来的形势演变过程,1至2月份,超过90%的全球病例报告来自中国,疫情对东亚供应链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国,中国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被迫暂停。此时国外经济体感染人数较少,尚未受到严重经济冲击,因此属于第一阶段,而到3月份东亚各经济体以及欧美等国家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美国股市出现严重动荡,可以视为第二阶段经济影响。

对于东亚生产网络来说,疫情的经济影响可以从供给侧、需求侧、供应链和金融领域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供给侧冲击直接影响东亚区域的实体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东亚生产网络的不同路径中,从供给侧传导的冲击对东亚区域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最为直接。与从房地产领域最先暴发,并最后再通过金融领域传导至实体经济的2008年次贷危机不同^[8],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直接作用于供给侧。疫情暴发后,为了避免大面积传染,企业按照政府指导意见暂时中止生产,大量生产线工人和管理人员不得不暂别各自工作岗位,导致各产业投入劳动力不足,生产产量显著下降。制造业方面,由于生产恢复日期不断推后以及原材料供给不足等原因,纺织、服装、家具、造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受消费产业的传导影响,食品制造、酒水饮料制造也受到较大影响。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从消费、投资与进出口方面影响总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东亚生产网络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均面临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消费,而投资和进出口在宏观政策的影响下抵消部分冲击。消费方面,因受居家隔离、交通管制等因素影响,旅游、餐饮住宿、交通运输、教育培训等服务消费受影响较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1—4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6.2%,达到10.67万亿元。虽然互联网购物能一定程度上够弥补整体消费的低迷,但无法完全替代线下消费。住宿、餐饮等消费也难以在疫情过后获得等量补充。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受此次疫情影响,除中国之外的东亚区域消费品零售额将下降22%。在疫情的影响下,医疗卫生相关服务需求出现大幅增长,医药品和医疗设备与医疗服务的消费大幅度增加。

在投资方面,资金流动不畅对东亚区域企业生产活动影响很大,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陷

入停滞,同时由于投资品供应难以保障,企业设备购买与更新、存货投资等投资活动也会受到影响。2020年1—4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3.68万亿元,同比下降10.3%,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3.3%。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小型企业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对于资金链原本就紧张的中小企业而言面临更多风险。疫情使得供应链上下游需求变得不再稳定,导致运营产能出现变数,现金收入急剧下降。中小企业的资金链依赖生产周期的稳定,一旦生产周期被打乱,很可能造成资金链断裂。若疫情引发对未来增长的负面预期,那么投资期望收益率将会降低,企业不得不调整投资计划,被迫降低投资。在进出口方面,由于国内外生产与消费受到影响,东亚市场进出口需求相应下降。东亚企业在延迟开工或产能利用率不足的情况下会使大量出口订单延期而违约,引发部分出口订单退单或转移至东亚区域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受到疫情影响,东亚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将减少1.24万亿至1.87万亿美元。^[9]

第三,疫情通过供应链传导形成二次冲击。通过供应链传导的冲击不同于供给端直接冲击,而是一种二次冲击。上游企业原材料供应受到限制时,将通过供应链条逐步传导至下游。同时,下游企业的生产直销也会使得冲击影响上游企业生产。由于中日韩在东亚区域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中日韩受到的产出影响随即通过供应链传导至东亚其他区域。

以全球纺织品产业的供应链为例,中国处在全球纺织品领域生产与贸易的核心位置,其纺织品生产和贸易将很容易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其他国家(地区)。^[10]在东亚生产网络中,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是仅次于中国的重要纺织品生产国家(地区)。另外,全球纺织品产业供应链格局下,各区域均形成了各自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如意大利是欧洲纺织品的制造工厂,而美国处于北美地区纺织品供应链的核心位置。由于越南等主要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高度依赖中国的生产材料供应,2020年2月在中国纺织工厂全面停工的情况下,东亚区域的服装加工制造都面临材料短缺、无法按原进度生产的困局。3月开始,在中国境内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产能逐渐恢复的同时,新冠疫情却在世界其他地区迅速蔓延,表现为第三阶段疫情影响回流的特点。

再比如,在信息通信技术产品领域供应链方面,中国虽然也处于中心位置,但与纺织品供应链相比有一些差别。首先,在信息通信技术产品方面,中日韩三国构成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共同枢纽。作为东亚区域制造业枢纽,中日韩三国对美国的出口占美国总进口额的25%以上,占美国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进口额的50%以上。^[11]其次,信息通信技术中的供应链区域性特征强于纺织品。也就是说,东亚区域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供应中断会对区域生产产生影响,但不容易波及世界其他区域相关产品的生产。再次,不同行业受到冲击影响不仅受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同时也与自身行业生产特点有关。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生产体系比其他行业更加脆弱。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通常保持较低的库存水平,而且许多电子元件缺乏替代资源,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供应链,因此受到冲击时无法快速转移供应链。

汽车制造业作为东亚重要制造业领域之一,也是因国际供应链破裂而受到严重影响的领域。在汽车制造业领域,韩国现代汽车从中国大规模采购的汽车零部件出现断供,该公司将暂停其在韩国的生产。受此影响,2020年2月韩国汽车总产量与出口量同比下降约26.4%和16.6%,而这发生在韩国暴发大规模疫情之前。到4月,中国大规模复工复产的情况下,韩国、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区域发生的疫情重新影响中国汽车工厂的生产,这对跨国产业链的运转与维系无疑又是一大重击。

第四,疫情阻断了正常资本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发生动荡。面对疫情的冲击,金融市场非常敏感和脆弱,而且传导速度也非常快。即使疫情没有真实传导到实体经济,或者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大影响,仅仅是预期就可以影响到金融市场。疫情防控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存在“悖论”,适度的“恐

慌”有助于提高居民的防控意识,但这却将加重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因此,甚至一些国家在疫情暴发状况并没有达到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出现金融市场的动荡。另外,部分国家的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不够及时,这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导致他们集体抛售风险资产、追逐避险资产。2020年3月,美国道琼斯股市在10余天内4次触发熔断机制,菲律宾、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股市也纷纷熔断,足见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受到疫情影响,新兴经济体大量资本外逃,其外逃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造成有史以来新兴经济体最严峻的资本外流,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出现的概率。

三、东亚区域各经济体共同应对疫情的策略

第一,加强东亚区域联防联控,建立高水平的疫情防控协调机制。为了应对本次疫情带来的长期影响,东亚经济体有必要在本地区建立更高水平的疫情防控协调机制,对东亚区域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速度,共同维护区域生产供应体系。通过东亚疫情防控协调机制,东亚经济体共同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推动东亚地区能够尽快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各经济体有必要加强各国卫生、海关、交通、移民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就疫情信息、防控措施、出入境人员管理等进行密切沟通,形成防控合力,遏制疫情蔓延。同时,加强流行病学科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积极开展药物、疫苗等研发合作,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

东亚各经济体应当就医疗物资的生产、需求和供给保持协调,为企业采购相互提供便利。东亚各经济体有必要共同设立抗击疫情特别基金,通过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和10+3合作基金等渠道提供必要支持,使其发挥更大作用。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

第二,加强东亚区域宏观政策的协调。在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下,东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东亚区域以及全球各国需要在宏观政策上进行密切协作,共同降低疫情对区域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2020年2月份以来,东盟与中日韩等国家多次通过电视电话以及视频会议商讨共同应对之策,并于4月14日发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该声明体现了东亚经济体共担风雨、共克时艰的决心和意愿。声明中的一系列共识不仅着眼于当前,也为疫后合作指明了方向,对恢复地区经济活力、推动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宏观政策协调上,东亚经济体政府可以共同向市场发出信号,协调一致地采取包括采取宏观刺激政策在内的适当和必要措施。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对于克服疫情影响至关重要,包括帮助面临卫生与融资双重冲击的一些经济体克服资金约束,以及向医疗体系薄弱的经济体提供援助。警惕可能影响地区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密切区域金融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密切监控本地区经济金融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并协商研究应对方案。

第三,中日韩密切协作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和稳定,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中日韩作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共同枢纽,有必要加强中日韩战略性产业合作。如前所述,中日韩三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从原材料和零部件到中间品的生产与供应关系紧密,外部经济冲击更容易使这些经济体形成协同效应,因此凸显中日韩三国强化关键制造业领域合作的必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给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背景下,中日韩应以共同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为重点,推动形成三国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制。^[12]中日韩有必要在汽车制造、电子通信、

化工、钢铁、机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制造业领域形成分工合作新机制,提升三国在这些产业领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推动三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发展。在当前疫情严重妨碍跨境货物、资本与人员流动的背景下,保持物流网络顺畅和持续运作,增强地区供应链韧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保证食品、商品、药品和医疗等必要物资供应,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或干扰地区供应链的障碍,必要时对货物与往来人员采取绿色通关方式,打造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更不易受冲击的供应链,保障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畅通,确保在疫情期间开展正常经贸活动。

疫情将引发全球各国转移和调整产业布局,进而对现有全球产业链格局带来重大变化。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新变局,中日韩有必要积极应对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不仅能够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还能有效应对逆全球化趋势。^[13]中日韩三方可先考虑搁置利益冲突集中的最敏感领域,在货物、服务、投资便利化等宽领域优先实现高水平的阶段性协定^[14],并逐渐、持续推动三国经济深度一体化,实现规制融合,探索三国共赢的合作新增长点。中日韩FTA谈判加速将会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防止在这一特殊时期区域内保护主义的进一步蔓延。中日韩FTA通过构建制度化合作机制,规范各国市场准入,明确争端解决机制,有利于营造稳定的市场准入环境,为东亚地区各国经贸安全提供全面保障。同时,中日韩可以务实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健康、养老、环保、科技研发等产业合作,大力发展中日韩数字贸易,加快落实“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 语

为了防控疫情蔓延,中国采取了多种防控措施,对于遏制疫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采取的有效防控举措,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赢得了时间。未来,中国要“内防反弹,外防输入”,杜绝第二波大规模疫情的回潮。适宜同时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and 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财政政策上,通过转移支付和减免税收的方法来补贴受疫情冲击比较明显的企业和家庭,尤其对中小型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缓解其生产经营困难,实现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冲击最小化。货币政策上,采取相对稳健的政策,鼓励融资担保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适当降低新增融资担保报废率。就业政策方面,大力发展吸纳大量劳动力的新兴服务业,通过鼓励中小微企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在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前提下,中国全力复工复产、恢复经济,以缓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虽然当前中国国内疫情已经进入基本控制阶段,但境外疫情依然严重,东亚区域产业链上下游失配现象严重。未来,东亚区域以及全球经济的衰退已无法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90%的经济体将陷入经济衰退,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到-3%。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加剧一些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可能会引发种族歧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动摇经济全球化的根基。面对来势汹涌的疫情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除了各国自身努力以外,国际合作对战胜此次危机至为关键。各国政府必须用开放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任何推卸责任的行为都是对世界的不负责。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东亚及全球各国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全方位合作,才能尽可能降低新冠肺炎带来的冲击,早日恢复区域经济增长。

注释:

①本文中东亚生产网络是指东亚区域内部包括中日韩、东盟、中国台湾等在内的各经济体在制造业上的产品内分工模式。

[参考文献]

[1]Fukunari Kimura and Mitsuyo Ando.*Fragmentation and agglomeration matter: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3, Vol.14.

[2]罗仪馥.疫情冲击之下,跨国产业链面临重构压力[EB/OL].参考消息网,2020-04-08.

[3]成新轩.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基于中国产业战略地位的调整[J].当代亚太,2019,(3).

[4]刘恩专,刘立军.东亚经济周期协同性的贸易传导——贸易三元边际视角的一个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14,(3).

[5]姜跃春.中日韩合作的新机遇[J].东北亚学刊,2020,(2).

[6]2020年5月全球主要国家制造业PMI[EB/OL].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站,2020-06-06.

[7]卢锋.迟来的警报与逼近的风险:新冠全球流行的经济冲击[EB/OL].财新网,2020-03-16.

[8]佟家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20,(3).

[9]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 BRIEFS NO.133:Updated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Metro Manila:Asian Development Bank,2020

[10]World Trade Organization.*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Geneva: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20.

[11]Richard Baldwin and Beatrice Weder di Mauro.*Econom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London: CEPR Press,2020.

[12]迟福林,何冬妮.携手维护中日韩制造业供应链安全[N].经济参考报,2020-04-07.

[13]李天国.后TPP时代中日韩FTA的机遇与挑战[J].东北亚学刊,2018,(2).

[14]金香丹,刘雅君.前景理论视域下中日韩FTA建设的动力与挑战[J].亚太经济,2020,(1).

【责任编辑:薛 华】